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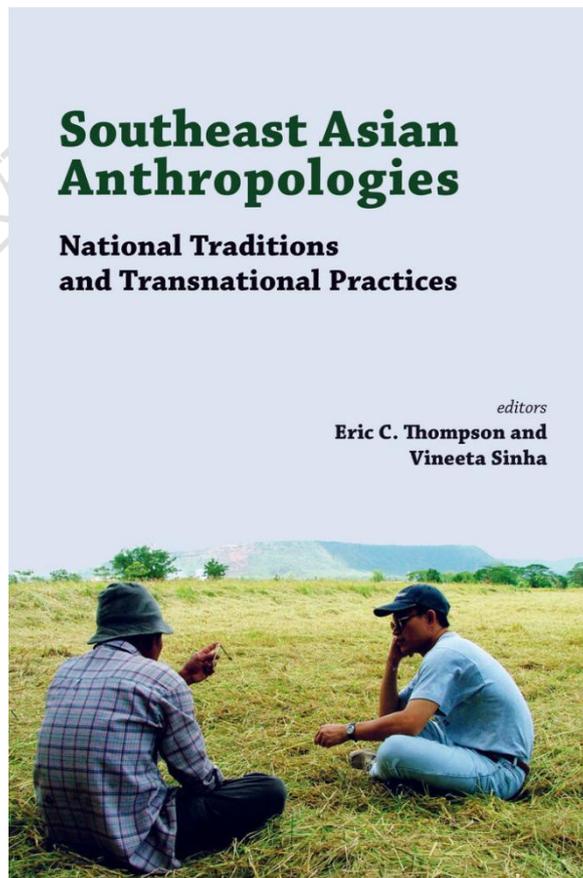
从殖民影响到本土化创新的东南亚人类学 | 东南亚地区《区域动态》12 月期

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分为“学术动态”及“时事动态”两大板块。“学术动态”推介埃里克·汤普森和维妮塔·辛哈主编的《东南亚人类学：国家传统与跨国实践》（*Southeast Asian Anthropologies: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Transnational Practices*）一书，讨论马来西亚人如何协商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身份的议题。

“时事动态”汇编了近一月内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整体的大事要闻，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

-----学术动态-----

编者按：东南亚人类学是一门融汇文化记忆与学术探索的独特学科，既记录了历史的深刻印迹，也展现了社会身份的不断重塑。《东南亚人类学：国家传统与跨国实践》（*Southeast Asian Anthropologies: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Transnational Practices*）由埃里克·汤普森（Eric C. Thompson）和维妮塔·辛哈（Vineeta Sinha）主编，通过十个精心设计的章节，全景式呈现了东南亚各国人类学从殖民影响到本土化创新的发展路径。书中深入探讨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并通过跨国互动揭示了区域知识体系的多元可能性。本书不仅反思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东南亚学术的长期支配，还展望了东南亚人类学如何以本土为根基，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构自身的学术话语，为全球南方重构知识生产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亚洲研究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于 2020 年 9 月发布普渡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塔达·多科（Dada Docot）关于埃里克·汤普森和维妮塔·辛哈主编的《东南亚人类学：国家传统与跨国实践》书评文章。埃里克·汤普森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维妮塔·辛哈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系教授。塔达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罗纳托·罗萨尔多、伊芙琳·布莱克伍德（Evelyn Blackwood）、詹姆斯·斯科特、克利福德·格尔茨、珍妮特·卡斯滕（Janet Carste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米里亚姆·斯塔克（Miriam Stark）、索尔海姆二世（Wilhem Solheim II）、费妮拉·坎奈尔（Fenella Cannell）——仅举几例——他们都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其东南亚研究著作已经成为经典。这些经典之作曾引发并推进了学科讨论，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类学学会至今仍未专门设立一个东南亚研究分会，以在一年一度的美国人类学年会上汇聚该地区的专家学者，并为培养新一代学者提供平台。更令人费解的则是，为什么那些拥有东南亚背景的学者，他们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的人类学学科对话。这表明我们在促进知识交流上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特别是要

将东南亚人类学家的研究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东南亚人类学：国家传统与跨国实践》一书的十个章节采用复数的“世界人类学”视角，呼应了早些时候的学科讨论，即强调不同语境和需要下形成的多元知识生产。该书由埃里克·汤普森和维妮塔·辛哈负责编辑，汇集多篇文章，代表了当代“东南亚人类学家的‘家乡（at home）’实践”（第 4 页）。各章节详细介绍了东南亚本土学者的人类学研究，以期在更广泛的人类学讨论中突出东南亚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倡议。

围绕“民族性”（nationhood）概念形成的东南亚人类学学术“传统”以及对其的背离，贯穿本书的各个章节。以菲律宾为例，何塞·乔威尔·卡努戴（Jose Jowel Canuday）和艾玛·波里奥（Emma Porio）在第一章中探讨了“菲律宾人”这一泛化的身份认同和菲律宾国家建设项目同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他们将菲律宾身份认同的形成追溯至 19 世纪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美国殖民占领时期、战后重建、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和后马科斯民主时期。两位作者卓有成效地讨论了菲律宾人类学与身份政治之间的交织关系，并从中剖析“殖民人类学的裂隙”以及菲律宾人类学家如何回应这些由来已久且普遍化的身份认同叙述。

（本土）学术界在争取其存在和意义的过程中，往往面临暴力和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在本书各章中比比皆是。在第二章中，奇沃因·佩欧（Chivoïn Peou）讨论了柬埔寨人类学。柬埔寨人类学在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夹缝求生，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越战的冲突外溢以及 70 年代红色高棉政权的统治。这些都受到法国殖民影响的支持，通过引入“遗产”来实现现代化和发展。佩欧认为，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人类学是努力构建和重建柬埔寨历史的有益工具，但这项工作“路漫漫其修远兮”（第 76 页）。层层叠叠的冲突严重破坏了教育系统，导致缺乏一个进行高级人类学培训的合适场所，从而限制了人类学工具在社会和政治修复中的广泛应用。

本书也谈到了在个别国家扎根的不同思想流派，它们塑造了当地的人类学传统。在第三章中，阮文正（Nguyen Van Chinh）认为必须打破一种常见的观点，即越南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知识生产与西方人类学是可以区分开的。阮文正并未采纳越南人类学“苏维埃化”的重复论调，而是呼吁将越南人类学的发展定位在“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第 84 页）。这一章还特别强调，包括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人类学传统，存在进化论的假设，这样的假设让人类学把少数民族描绘为静态和无时间性的。

本书各章也都注意到，在东南亚“本土”（native）人类学家搭建主体性的过程中，殖民人类学的影响散之不去。受西方学术传统影响，对异域他者的探索往往会边缘化那些对当地

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第四章中，玛丽亚·F. 曼加哈斯（Maria F. Mangahas）和苏珊娜·罗德里格斯—罗尔丹（Suzanna Rodriguez-Roldan）启发我们思考菲律宾的海洋人类学这一仍待探索的领域。作者强调了讨论菲律宾人类学“内陆偏见”的必要性（第 131 页）。同时，考虑到菲律宾的群岛地理特征及其人口多分布于沿海地区的实际情况，两位作者也呼吁加强对菲律宾沿海地区的研究。菲律宾沿海社群研究的缺乏是西方人类学“陆地导向”的结果，而菲律宾的学术研究正以此为基础。

杨成冠（Yeoh Seng-Guan）在第五章讨论了马来西亚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背景与主体建构和田野调查的关系。杨成冠梳理了马来西亚人类学的历史发展，颇为有趣，因为它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也从雷蒙德·弗思和埃德蒙·利奇等人的经典著作对马来西亚的影响中脱离出来。杨成冠的叙述丰富了关于“本土”（native）和“土著”（indigenous）的讨论，因为马来西亚人类学尚未拓展其“跨族群”的视野，当地人类学家倾向于研究自己所属的族群，而不会去研究其他族群。

本书各章均提到了人类学的建制化及其在后殖民时期争取学科合法性的过程，新加坡在这点上尤为显著，因为新加坡的公共官僚体制对学术界影响较大。在第六章中，维妮塔·辛哈讨论了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不寻常的“联合”关系，社会学似乎在教师聘任和研究经费支持方面更受国家重视，因为它“被认为更符合发展中的现代城市社会的需要”（第 189 页）。然而，不同于西方机构中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分野，辛哈认为新加坡的学术环境容纳了两者之间的合作，促进了一种和谐的“建制上的协同（institutional co-location）”（第 195 页）。读者或许会怀疑，这种联合的概念究竟是有机运作的，还是服务于国家需要。

在第七章中，维克多·T. 金（Victor T. King）和扎瓦维·易卜拉欣（Zawawi Ibrahim）梳理了婆罗洲四个地区的人类学的当地和跨国发展，通过四个“世代”追溯学科发展历程，从外国学者主导的“传统”学术到目前最为流行的政治性“文化研究”趋势，涵盖的主题十分广泛，集中于民族国家、宗教、媒体、移民、族群冲突、遗产和城市性同多数和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的关系。

在第八章中，尤妮塔·T. 维纳尔托（Yunita T. Winarto）和伊万·M. 皮鲁斯（Iwan M. Pirous）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人类学压倒性的家乡导向。两位作者回应了印度尼西亚人类学是否发展出了其独特的自我民族志传统。他们认为，即使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学家大多在本国开展工作，但实际上自我民族志者寥寥无几，因为这些人类学家选择的田野地点通常不是他们自己家乡社群的所在之处，从而还是成为了“局外人”。这种知识生产形式实际上复制了研究他者的人

类学方法传统。正如本章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即使置身本土的人类学家在“家乡”开展研究，西方人类学的他者化观念依然存续。

邓元英(Dang Nguyen Anh)在第九章讨论了在市场经济改革导向的革新时期(1986–2015年)、越南人类学的工具化问题。作者认为，革新前的越南人类学以描述性的民族学研究为主，聚焦于少数民族，当代的越南人类学则变得更有参与式、混合和跨学科的色彩，其研究目标是满足越南的“实际需求”。邓元英指出，越南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家的研究影响”（第 283 页）。在越南日益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作者似乎在呼吁一种“国际融合”，其中包括一种人类学的“革新”形式，即用英语作为主要研究语言来实现全球化，并倡导人类学家积极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

在第十章中，拉塔纳·托萨库(Ratana Tosakul)讨论了泰国批判性跨国人类学的新趋势。托萨库认为全球和跨国人类学很有前景，因为它们“与传统的、本质主义的文化概念批判对立”（第 311 页）。2000 年代初，一批海归人类学家给泰国学界引入了批判性理论，这些理论更新了人类学对话，超越了对乡村生活的民族志研究，开始探讨泰国、越南和缅甸流动的地缘政治边界内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我赞同东南亚的人类学家应当仔细思考移民和跨境流动如何影响了我们所研究的社群的日常生活。跨国视角对于打破人类学其研究对象的无时间性假设至关重要。

这本文集为不断扩充的东南亚研究文献增添了新内容，这些文献主要聚焦于本地区一系列相关议题，包括简·埃克森(Jane Atkinson)和雪莱·埃林顿(Shelly Errington)的《权力与差异：海岛东南亚的性别》(*Power and Difference: Gender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1990)、斯蒂芬·斯帕克斯(Stephen Sparkes)和西格妮·豪威尔(Signes Howell)的《东南亚的家屋：变化中的社会、经济与政治》(*The House in Southeast Asia: A Chang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omain*, 2003)等作品。对于想要了解东南亚地区人类学学科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者来说，本书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处于起步阶段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也能在各章节中找到大量参考文献和研究方向建议。该文集向读者展示了在该地区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广阔可能性，但若有读者希望了解酷儿人类学，则需另行查找相关资料。对于那些希望去殖民化并重新设计课程大纲的人类学教授而言，本书中由东南亚人类学家撰写的众多奠基性著作也将带来不少帮助，这些著作超越了西方学界常见的作品范畴。

总之，这些章节带我们高屋建瓴地回顾了东南亚地区共同经历过的殖民主义、掠夺和暴力，人类学家的学术动态和实践回应，以及在殖民人类学和新兴威权主义政权的阴影之下、

人类学定位学科位置所面临的挑战。

(英文原文见: Docot, D. (2021). Southeast Asian Anthropologies: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Edited by Eric C. Thompson and Vinceta Sinha. Singapore: NUS Press, 2019. 328 pp. \$42.00 SGD, paper. ISBN 978-981-4722-96-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2), 310–312. doi:10.1017/S1479591420000522. 本文为开放获取)

《信息、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于 2022 年 5 月发布瓦莱岚大学 (Walailak University) 人文学院亚洲研究博士项目助理教授西丽彭·松布翁布拉纳 (Siriporn Somboonboorana) 关于埃里克·汤普森和维妮塔·辛哈主编的《东南亚人类学: 国家传统与跨国实践》书评文章。西丽彭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作为一名常驻泰国的本土人类学家,我在过去二十年里同时在本地和国际语境中进行人类学研究,一直以来都在期待这样一本著作。尽管过去三十年来,人们对亚洲人类学的兴趣持续增长,但有关东南亚人类学发展的出版物却少之又少。鲜少有人探讨它与区域内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的关联。相较而言,日本人类学在十九世纪早期便已萌芽,并在亚洲相关学科中一直占据信息的前沿地位。印度的人类学家在十九世纪殖民人类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应用研究方法,他们对原住民的研究协助尼赫鲁政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实施了福利政策。中国的人类学则集中于研究亚洲大陆主要地区的民族学与族群课题。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过去数十年里都已形成了各自稳固的人类学学派。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历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新加坡和文莱,与上述例子也存在显著不同。这些国家的学术追求是怎样的?《东南亚人类学: 国家传统与跨国实践》将成为每一位对东南亚人类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读者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每一章均由常驻东南亚地区的本地人类学家和国际学者撰写,这些学者是探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文莱、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各类议题的专家。我非常兴奋地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努力摆脱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遗产束缚,开展符合自身国家和区域需求的研究。

本书依照知识生产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顺序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人类学传统的形成”,主要探讨菲律宾、柬埔寨和越南的人类学如何在大学课程、专业协会及倡议组织中逐渐成形,并由此构建了自身的历史语境。第一章中,何塞·乔威尔·卡努戴与艾玛·波里奥

通过追溯“菲律宾人”这一概念在菲律宾人类学机构的学术话语中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切入他们的核心问题。两位作者指出，过去与当今的菲律宾人类学实践以及未来的潜在学科发展，皆源于一种希望保留并发展人类学的意愿——在人类学者看来，这门学科与民族共同体所想象的社会与政治物质条件密切相关。第二章中，柬埔寨人类学家奇沃因·佩欧不仅探讨了 20 世纪 70 年代红色高棉政权如何以极左意识形态侵蚀本土学术，也分析了近年来国家学术如何在“国族建设”的背景下推动对传统身份及相关领域的重构。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章里，越南文化人类学家阮文正聚焦于革新政策，认为它是一个更具全球化前景的契机，能够将社会主义民族学的概念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化人类学新趋势相结合。然而，这一融合进程依旧比人们所期望的更为缓慢。

第二部分“人类学实践中的挑战”由两位菲律宾人类学家玛丽亚·F. 曼加哈斯和苏珊娜·罗德里格斯—罗尔丹开篇。她们探讨了菲律宾的海洋人类学，而这一领域在主流学术机构和民族国家叙事中并不受青睐。作者们也明确且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研究脉络之中，并广泛运用了与渔业资源相关的地方知识文献等“非正式”资料。杨成冠展示了社会人类学如何自殖民时期起，经过多元文化与多族群视角的演变，在马来西亚西部（西马）发展成现今较为成熟的学术研究。新加坡人类学家维妮塔·辛哈则关注“官方声明”——这也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并由此指出新加坡在制度与学术实践上对人类学所施加的多重压力。

第三部分聚焦“跨国人类学的趋势”，汇聚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学者，探讨东南亚人类学的过去与未来，也将目光投向当前民族国家边界和跨国互动的现实。在第七章中，维克多·T. 金和扎瓦维·易卜拉欣重新审视了“谁研究谁”这一辩论，并以婆罗洲人类学为切入点，突破“西方对阵非西方”的旧有困境。随后，第八章里，尤妮塔·T. 维纳尔托与伊万·M. 皮鲁斯再度检视了印度尼西亚人类学中对“他者”的固有认知。接下来，邓元英从革新政策阐发出思考，希望推动所谓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国际化，以便通过学术成果助力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从而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最后一章中，拉塔纳·托萨库聚焦泰国人类学家在国内外人类学学术机构所开展的跨民族志研究，着重讨论在边境与移民研究领域中新近涌现的趋势。

作为一名常驻泰国的本土人类学家，并在过去二十年里同时在本地与国际环境中开展人类学研究，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感到格外兴奋。全书各章节收录了多位东南亚学者关于本地区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研究与见解。此外，我们还能从书中看到，每位作者都在各自国家的语境中积极思考和努力建设这一学科。虽然他们在知识生产层面，仍对现代西方在权力与表征方面的不平等保持批判态度，但本书的重点放在探讨人类学本土化的发展进程，以及东南亚人

类学家的“家乡”实践。与此同时，本书也为东南亚人类学的未来绘制了蓝图——如何在当代学者所展现的多元区域与全球视角下，突破过度简化的东西方二元对立。

我认为，这本书对于那些关注信息与亚洲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人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这本及时而意义重大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本土人类学家对当代东南亚人类学学术研究现状的宝贵审视。东南亚人类学已经改变了本领域内知识生产的地区结构。因此，如果东南亚的研究经费、教育机构以及学术论坛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为教学与研究层面提供跨区域专业化的平台，那么我们对东南亚知识生产的前景就更应充满期待。我相信，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本土东南亚人类学家，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知识与研究成果，学会在全球南北的互动中批判“我们自己”。此外，缅甸和菲律宾的族群冲突、城市地区贫困人口与中产阶级的增长等诸多议题，也亟待我们深入探究。

（英文原文见：Somboonboorana, Siriporn. (2022). Southeast Asian anthropologies: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JIDI)*, 6 (1/2), 97–99. doi:10.33137/ijidi.v6i1.38093. 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戴蓉瑄

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学术动态

【泰国】

泰国出台新法令打击网络犯罪

泰国副总理兼数字与经济部部长巴瑟表示将向内阁提出关于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的紧急法令。该法令要求金融机构和移动通信运营商共同向网络犯罪受害者承担责任。其中移动通信运营商需要对含有链接的短信进行筛选核实，如果运营商允许可能含有欺诈的链接被发送，而这些链接最终导致用户银行卡被盗，移动运营商应该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在金融机构方面，法令要求各商业银行限制非法交易行为。针对用户信用卡被盗刷的问题，泰国央行已经责令各商业银行以及信用卡服务提供商加紧调查，赔偿受害者损失。为了防止用户信息

被用于从事非法活动，法令对法人购买和销售 SIM 卡也做了一定的限制。同时法令还对 Facebook、Tik Tok 等平台中与在线赌博相关的内容和广告进行了规定。若法令得到内阁批准，将在 3 天时间之内在皇家公报上公布。

——新闻来源：Thairath/泰叻报，2025 年 1 月 10 日

【越南】

宁顺省核电站项目指导委员会成立

宁顺省人民委员会主席陈国南 23 日签发决定，成立宁顺核电站项目指导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办事机构，以在该省职权范围内促进宁顺核电站项目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席为宁顺省人民委员会主席陈国南，常务副主席为宁顺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郑明皇；副主席为宁顺省工贸厅厅长。指导委员会每三个月定期召开一次会议，并根据委员会主席的要求举行会议。

宁顺省人民委员会领导表示，根据政府总理的意见，宁顺核电站项目将在 5 年内建成。对于宁顺省来说，当前任务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对核电站的认识，从而助力项目落地。宁顺省委宣教部常务副部长阮文梅表示，在宁顺核电站项目重启政策出台后，宣教部颁布了第 3188 号公文（3188-CV/BTGTU）征求民意并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民意调查的 2000 个民众中，超过 92% 的民众表示知晓核电站项目重启政策，并对该政策表示支持。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plus，2025 年 1 月 24 日

进口老挝电力 500kV 输电线路项目越南段成功架通

据越南电力集团电力项目管理委员会消息，2025 年 1 月 23 日 22 时 43 分，500 千伏季风（Monsoon）—盛美输电线路项目越南境内段成功架通。这一输电项目十分重要，用于将老挝季风风力发电厂的电力输送到越南，预计在 2024-2025 年期间为国家电网增加 600 兆瓦。500 千伏季风（Monsoon）—盛美输电线路项目越南境内段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动工，由越南电力集团（EVN）投资，电力项目管理委员会被指定为投资方的代表。项目越南境内部分位于广南省南江县，长约 44.71 公里，项目总投资逾 1.1 万亿越盾，连接老挝季风风力发电厂至广南省 500 千伏盛美变电站。

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地形崎岖、气候恶劣等原因，困难重重。但在电力项目管理委员

会和有关各单位的努力下，越南境内项目部分比计划提前 40 天完工。500 千伏季风—盛美输电线路最大输送容量可达约 2500 兆瓦，有助于提高越南国家电网的运行能力。在老挝季风风力发电厂建成后，越南将通过该输电线从老挝进口 600 兆瓦电力，预计年均发电量约为 17 亿千瓦时。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plus，2025 年 1 月 24 日

越南对菲律宾出口额首破 60 亿美元大关

据越南驻菲律宾大使馆商务处表示，2024 年越南与菲律宾进出口额突破 85 亿美元的大关，出口额首次突破 60 亿美元大关，贸易顺差首次突破 35 亿美元。

据工贸部的统计数据，2024 年，越南与菲律宾之间进出口总额达 8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以上，其中出口额达 6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2%；进口额达 2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6.7%。2024 年，越南对菲律宾贸易顺差 37.2 亿美元，高于计划的 35 亿美元目标。

在 2025 乙巳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该数字令人印象深刻。2022 和 2023 年两年，越南对菲律宾出口额仅为 78 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分别为 24 亿和 25 亿美元。在越南正为出口商品开拓市场、减少国内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压力的背景下，这是可喜的信号。

大米是对越南对菲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商品。出口额为 5000 万美元至 1 亿美元的商品包括钢材、化学品、钢铁制品、塑料制品、电缆等。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plus，2025 年 1 月 24 日

【马来西亚】

美国 AI 芯片出口管制升级，马来西亚数据中心面临挑战

1 月 13 日，拜登政府在卸任前一周发布新政策，提出进一步收紧 AI 芯片及相关高性能计算技术的出口限制，重新划分全球市场等级，并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第二等级”国家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近年来，随着国际超大规模云端服务提供商（Hyperscale Cloud Providers）如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 和谷歌云（Google Cloud）等在马来西亚积极投资并建设数据中心，马来西亚逐渐显现其作为东南亚数字枢纽的战略价值。然而，这一政策调整预计将对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产业、电子代工服务以及相关供应链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艾芬黄氏资本（Affin Hwang Capital）的最新分析，美国的新规可能导致马来西亚

AI 服务器制造商的客户群体萎缩，从而影响本地电子代工业的成长预期。部分分析师已下调马来西亚部分电子代工股的投资评级，认为在当前的高度受限环境下，企业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云端运营商的业务来维持增长。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科技巨头可能会减少在马来西亚的数据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加剧行业的不确定性。

针对美国新规可能带来的影响，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表示，目前的出口限制不会影响现有数据中心的日常运作，但政府将密切关注未来可能的政策调整，并加强与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的沟通，以确保马来西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稳定地位。他还强调，马来西亚需要强化本土半导体产业链生态，而非仅依赖工业园区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以打造更加韧性和可持续的经济结构。马来西亚已经在全球半导体封装与测试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政府也会寻求扩大本地芯片设计和高端制造能力，并积极加强与中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合作，减少对单一国家供应链的依赖，从而提升产业韧性。未来，政府还会通过实行税收优惠、投资激励和产业政策等举措引导国内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进一步提升整体科技产业的竞争力。

新闻来源：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马来西亚东方日报，2025 年 1 月 20 日

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协定正式签署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在布城举行第 11 届马来西亚-新加坡领导人务虚会期间签署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协定，确定将就四大方面展开互惠合作。该协定目标是在 10 年内推进近 100 个项目落地，并创造约 2 万个就业机会。根据协定，经济特区范围涵盖依斯干达特区和边佳兰（Pengerang）。协议强调四大领域合作：一是鼓励第三国和新加坡企业在经济特区投资；二是促进人员和货物流通，分阶段实施自动通关通道和无纸化货物通关；三是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教育合作；四是提高在经济特区经商便利性，加强两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马来西亚还将为经济特区提供一篮子税务奖励措施，包括对高增长和高增值领域进行新投资的公司，实行特别公司税率。

来源：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海峡时报，2025 年 1 月 8 日

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马来西亚

日本首相石破茂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其 2024 年 10 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问马来西亚。访问期间，石破茂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会晤，就经济和安全合作交

换意见。在讨论贸易和投资时，安瓦尔承认日本与马来西亚国有能源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及日本技术（包括碳捕获和储存技术）对马来西亚清洁能源政策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同意深化在教育、减灾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马来西亚还将在日本支持下建设一座非放射性稀土元素加工厂。安全方面，双方表示将强化日本-马来西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海上安全合作，包括加强日本海岸警卫队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合作。

来源：马来西亚外交部，2025 年 1 月 10 日

【东帝汶】

东帝汶将主办高级区域气候变化与健康会议

2025 年 1 月 22 日，世界卫生组织驻东帝汶代表阿尔温德·马图尔（Arvind Mathur）表示，东帝汶卫生部（MoH）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于 2025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帝力主办气候变化与健康区域会议。此次会议将汇聚国际专家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倡导采取综合性方法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马图尔在采访中表示：“这是一次全面讨论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会议，探讨健康领域如何帮助减少卫生部门的碳足迹。”

气候变化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健康，包括极端天气事件、空气污染以及食品和水资源的变化。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气候变化影响健康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如热浪、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和疾病，食品系统的破坏，动物源性疾病的增加，以及水源性、食源性和媒介传播疾病的扩散，甚至还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马图尔表示，会议将汇集来自多个国家的观点和经验，分享他们的理念并协助东帝汶减少碳足迹。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 10 个成员国，孟加拉国、不丹、朝鲜、印度、印尼、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泰国的代表预计将参加为期四天的会议。

新闻来源：TATOLI/东帝汶国家通讯社，2025 年 1 月 22 日